

岑 桑

船藏素以考天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成都

封面设计：杨守年

躲藏着的春天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875 插页2字数155千
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118·415 定价：0.65元

灾难与希望混纺而成的故事

(代序)

如果有谁认为这个集子应该归入“伤痕文学”的一类，我是不会持异议的。我不欲讳言自己心中那至今仍在隐隐作痛的伤痕，以及我对那个逝去未久的灾难时代的怨愤。

这个集子，收进了中篇《躲藏着的春天》和四个短篇。中篇曾刊于《花城》文学丛刊第二集；四个短篇也曾分别发表于报刊。成书时都曾作过程度不同的增删和润色。

这几篇小说，写的都是十年动乱期间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既然源于那个悲剧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带着血，带着泪，带着令人为之揪心的伤痛；人们还可以从中听见虎啸狼嗥和死神的笑声，因为这都是那个时代尽人皆知的特征，要避免都避免不了的。然而除此之外，那里面还有着愤怒和反抗，有着涂不污、熏不黑的心灵和泼不灭、淋不熄的火焰……。象那幅曾在我们忧愤的目光之前悠然而过的，充满刀光剑影的历史长卷一样，这些故事也是由灾难与希望混纺而成的，不仅仅有愁云惨雾而已，分明还有电光石火，使人们得以从沉沦中看得见生机和光明。当我们向历史的空谷侧

耳静聆那依稀可辨的回音，仍可听见人民的哭泣声中隐然涌荡着断断续续的浩歌。它虽被一阵阵喧嚣所掩盖，然而只要细心谛听，还是可以辨认得出来。这正是我在这个集子的几个故事中所要表现的一个总的主题。

我是那个灾难年代的丑恶现实的目击者和受害者，曾经困惑而又痛苦地经历那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荒诞的风暴，痛心于它祸患的深重，惊异于它的残酷与愚蠢。我耳闻目睹过关于它的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荒唐事，无从理解人类血液中那沉淀已有千百万年的原始兽性，何以竟然会在一夜之间升腾而起，使某些人物蓦地变得丑陋而狰狞，叫人简直无法认识了。相形之下，处于他们对立一方备受凌辱与折磨的人们，却往往以自己道德的燧石抗击迎面而来的斧钺，发出美丽的火花，因之显得格外可爱。再也没有比那个沉渣泛起、鱼龙混杂的时代更易于正确识别别人的了。所以我也曾因此而比较透彻地识别了许多人，美的、丑的，善的、恶的，真的、假的，都一一在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写的这几个故事中的人物，其中有不少就是以我自己所熟悉的某些人为原型的；有的情节，也并非随意凭空虚构。我只是有愧于未能表现那些典型的人和事于万一罢了。因此我觉得自己肩膀之上还有卸不掉的担子，我还得继续描绘那个荒唐时代的众生相，以我笨拙的笔触，去反映人与妖魔曾经如何在那历史的瞬息之间，展开一场又一场空前惨烈的生死搏斗。在那样的时刻，人人都表演得淋漓尽致了。多少人的灵魂跳出了躯壳，一丝不挂，游戏人间，彻彻底底地展览了自己还

恬不知耻。如果舍弃那一个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而不加以记录，不加以表现，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我第二次相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在得到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已经给作家以广阔的驰骋天地了。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歌颂，也可以暴露。这种创作自由是日益得到保证了的。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则任何题材都应该受到尊重。

因此我愿意重复一次：如果有谁认为这个集子应该归入“伤痕文学”的一类，我是不会持异议的。我不以为“伤痕文学”是一种命定有贬义的不祥之物，所以我丝毫也不会因为自己的作品内容或被归类于它而感到难堪。谁说揭露那个灾难时代的伤痕，竟会是违背作家的光荣职责的呢？那些伤痕还是殷红殷红的，抚之犹有余痛呵！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必须时常互相提醒，怎么也不能让它再度流血了。正是这样的一种责任感，促使我把那些伤痕化作了惊叹号，写进我的小说里去的。

我这样写了，而且今后还会这样写。

是因为心中涌溢着对党的信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之情；确信眼前那略嫌朦胧的光明必将日益显得灿烂，我才这样写的。

还因为认为对过去的否定其实就是对今天的肯定，对过去的揭露其实就是对今天的歌颂，我才这样写的。

允许我这样写，以及我敢于这样写，已经足以说明我们祖国业已经历了一场极其深刻的变化。我是将之当作一种巨

大的幸福来看的。

当然，我没有写好，而且应该说远远没有写好。因之，读者们的批评和帮助，对我来说也就实在太需要了。我期待着。

目 录

| | |
|--------------------------|-----|
| 灾难与希望混纺而成的 故事 (代序) | 1 |
| 躲藏着的春天 | 1 |
| 好汉不掉泪 | 185 |
| 如果雨下个不停..... | 201 |
| 爷爷啊， 爷爷 | 219 |
| “你解放了……” | 232 |

躲藏着的春天

一、“金字塔”下

南海之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有一个略呈半岛形的地方，这是国营东风农场所所在。大山的余脉伸延到这里渐趋平伏，倾斜入海，远远看去，就象一头古代恐龙伸长了脖子，俯下头来酣畅地吮吸湛蓝湛蓝的海水。

半岛上接近顶端的地方，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小山，人们管它叫龙角山。这山虽小，但是一年四季草木葱茏。山的东南边稍微有点凹陷。在那凹陷下去的山窝窝里，有一条终年涓涓不息的溪流，逶迤流经一片苦楝林子，然后汇聚成为一个新月形的山潭，又潺潺溢泻成溪，流往半岛南端低洼的地方，把小小的山溪水注入横无际涯的南海。南海泱泱大度，仿佛从来也不嫌弃这微不足道的奉献。

龙角山的山窝窝，因为面向东南，又得到溪流的润泽，所以花卉树木，长得特别茂盛；尤其每到春夏之交，在那许许多多直指长空的苍松翠柏之间，茑萝藤蔓发荣滋长，绿意融融；野百合、映山红、矢车菊，和那别名长春草的金盏

花，开得烂漫，五光十色，芬芳四溢，真是令人神往。怪不得农场工人们在山窝窝一侧那个小草坪上，用毛竹和茅草架起了一个三角形的小棚子，供午间休息纳凉之用。远望那草棚子，真象个小小的金字塔。

现在是冬天了，烂漫的山花早已凋谢，人们很少到这里来走动了。但是罗琴和丁若海偏偏选中了这个他们私下称之为“金字塔”的地方；今天大清早，他们俩便走到这小草坪上来了。眼下，他们并肩坐在“金字塔”前，眺望着蓝天沧海之间那梦也似的帆影。他们身边放着两个装满了开水的行军水壶，还有一个装着一包馒头和一小瓶酱黄瓜的帆布挎包。看来他们今天中午是不打算回宿舍吃饭的了。

是的，他们已计划好今天要在一块儿度过一整天，因为这双年青的爱侣要离别了。

罗琴要走了！

罗琴要走了，一纸补充招工通知，将要把这个讨人喜欢的姑娘，从伙伴们中间带走了。昨天，大伙已为她设了个简朴的饯别宴；明天一早，她便要离开农场，回城里去，由一个种植橡胶的工人，变成一个穿白围裙的纺织姑娘了。

一九七六年元旦已经过去了十八天。罗琴留在农场的最后一天，恰好是星期日。这就使得她有整整一天时间可以和丁若海在一起度过。她要使这一整天过得挺有意思，计划在这一天里走遍她烧过岜，割过茅，开过荒，种过树，筑过坝，抗过风……以及别的许多她曾为之流过汗的地方；她还打算向一些老职工告辞，感谢他们多年来的关心和教育。她

和这一切相处已有七、八年之久，临别依依，真是难舍难分呵！

这小小的“金字塔”，是这双年青的爱侣今天整个行程的第一站。近年来，他们俩常爱在假日里走到这里来玩耍。去年的一个秋高气爽的黄昏，两人在这里并肩而坐，流连忘返，倾诉情怀，细数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冉冉升起的颗颗明星。他们被那充满神奇色彩的秋夜星空迷住了，从满天流转的星辰中辨认一个个辉煌的星座，遥看星宿中天，织女中天，直到五车高悬的时分还不思归去。这两个年青人的爱情，一定是从那个美丽的秋夜开始的。难怪罗琴要来到“金字塔”这个值得纪念的地方，缅怀那业已流逝了的快活时光。

亚热带的冬天，只要太阳一出来，再冷的天气也不会使人觉得太难受。但是在龙角山上，趾高气扬的山风往返逡巡，气温不免要比山下冷得多。罗琴和丁若海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还是觉得寒气逼人。他们互相依偎着取暖，情话绵绵。

呵呵，想起那动荡的年代，回顾那汗水淋漓的日子，瞻望那令人困惑的前程，这成双成对的年青人该有多少可说的话呵！事情也真蹊跷，命运好象有意把这两个孩子捉对儿安排在一起似的：他们俩，同年同月生，同在十二岁的那一年考进了市东区十八中学的同一个班；一起戴上红袖章，在同一个小分队里执行他们自以为神圣的使命；后来又同乘一艘大轮船，迢迢千里，来到这个边远的农场。岁月如流，瞬眼

之间已是十个年头过去了……

“琴，你冷吗？”丁若海执住罗琴的一只手，问道。

“不！”姑娘哆嗦着，却还笑嘻嘻地说俏皮话：“天上有个太阳，我身边也有个小小的太阳。当然不冷。”

丁若海笑了笑。他一笑，脸上就现出两个笑窝，使他显得特别善良而真挚。他打趣道：“难道你在吟诗不成？你不住地打哆嗦，我才不相信你身边竟有个太阳呢！”

罗琴攥起小拳头，在丁若海厚实的胸脯上亲昵地捶了两下，娇嗔地说：“哼哼，封你做太阳，你就是太阳！”

丁若海捉住那只打人的小手，笑着说：“好好好！我受封！可我这个太阳呵，在你身边多少年月了，连你的一双手也没烤暖。不过，总算把它们烤硬了。”

“烤硬了？”

“可不是！”丁若海把她的手拉到唇边吻了吻，说：“瞧你掌上的老茧！我记得你这双手，从前是多么的柔软！”

罗琴用双掌往自己脸上擦了擦，笑道：“真象是两把刷子了。”她突然挣脱了丁若海的臂围，扭身过去，来了个恶作剧，用她的手掌在丁若海的双颊上使劲擦了几下。

“痛吗？痛吗？”她调皮地说，“待回到家里，我一定往姐姐白净的脸上擦呀擦，擦得她耳发热、脸发痛，好让她知道这些年我在这里是怎样熬过来的！”

丁若海笑道：“你擦她做什么？应该擦教育局长的脸，而且有多大劲就用多大劲。”

• • •

“擦教育局长的？擦他做什么？”罗琴眨巴着眼睛问道。

“要他让你进大学呗！”丁若海故意正色说，“你问：‘局长同志，痛不痛？’要是他说不痛，你就再擦狠一点；要是他说痛，你就说：‘可见我手掌上的老茧比《决裂》里的江大年的还要硬，该够格进大学了吧？’”

罗琴听了，前俯后仰地大笑起来。

丁若海用指头点了点罗琴的鼻子尖，说：“可你别高兴得太早，教育局长光看你的手茧，也未必会看重你，因为你的手掌虽硬，可一颗心却还柔软得很。”

“什么意思？”罗琴把耳朵侧过去。

“就是说，它天真、幼嫩，有点儿不闻人间烟火味。你是银河边的那颗织女星。”他用一双又圆又大，乌溜溜的眼睛深情地望着罗琴。

罗琴在丁若海的怀里嗔道：“我不承认！我不承认！”

丁若海摩挲着她的手说：“不承认也得承认。事情就是这样。就象我不承认自己连心上都长满了老茧也不行。”

“不，”罗琴闭上眼睛说，“其实你的心也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丁若海忧郁地说：“这是你的错觉，我最了解自己的心。我越来越觉得它变了，变得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认不出来了？”

“可不是！有的从前认为是神圣的、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现在却不那么认为了。我发觉有好些使我倾心过的东西，

后来却使我很伤心。……你记得么，那一年，敲锣打鼓的时候，我的上山下乡申请书，是用什么写的？……刺破指头用血写的呢！那时候我知道，不管我用的是什么东西写，甚至不管我写不写，也是非下来不可的，大势所趋么！可是我还是耗掉了几个CC的血，为的是我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不这样，我心里不舒坦呀！当时我的感情，又火热，又真切。一来到这地方，我就把自己的一颗心扑到橡胶林去了。可是，后来那些越来越多的令人丧气的事情，使我每逢想起那几个CC的血，就觉得自己实在可怜又可笑。

……你记得吗，我们都曾经和老职工们在一起，为了那些遭到除根灭种的咖啡，可可而伤心过，抚摩着遍体鳞伤的橡胶树流出眼泪；可是林彪死后，没有林彪的林彪路线还在农场作孽，我带头造了反，后来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林彪时代的红人，现在更是红得发紫。世界是他们的，至少他们自以为是他们的。我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不知道自认是几点钟的了？别人也不知道把我们看成是几点钟的了？”

“难道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不，”丁若海摇头说，“其实我们哪个不想争气，可是我们却生活在一个不容你争气的环境里；理想是多余的，勤奋被看成罪过。我们只能安于成为普通的劳动力，让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踩着肩膀爬上去。试问我们还能怎样争气呢？想当初，真是叫人不堪回首呵……”

想当初，想当初，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点燃了年青一代心中的火苗。同是十四岁的丁若海和罗琴，都忽然自我感觉在一夜之间年长了十岁，历史地肩承了革命的重担，热血沸腾，睥睨一切，深信旧世界将要毁于一旦，呼啦啦尽成粪土；而崭新的一切将会象流星雨一样从天外飞来。他们跻身于大群昨天还戴着红领巾，如今已戴上了红袖章，高视阔步，傲然过市，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己任的孩子们中间，离开了课堂，离开了熟悉的一切，甚至离开了正常的感情，浮游于奇迹般突然形成的政治风浪里，去干那些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些小小的“造反”者走街串巷，破“四旧”，立“四新”，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乐趣之中，自觉青春作伴，驰骋于彩云之间，俯瞰尘世，何等自豪！然而不久之后，丁若海的爸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丁朗之，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被揪斗了；罗琴的爸爸——市政协委员、全省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市东区十八中学副校长罗文渊，也因为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进“牛棚”。这两个“专政对象”的罪孽，理所当然地立即株连了各自的亲属。于是，丁若海和罗琴这一双昨天还在享受着“造反”的奇妙乐趣的少男少女，忽然都好象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原先那种升腾于云天之上的幻觉破灭了。同学们斜着眼睛看他们，在他们背后窃窃私语。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意识到自己已一下子变成了政治上的贱民，困惑、伤心和不幸的境遇，使他们常常走在一起，企图共同寻求问题的答案。

但是那答案永远是残缺不全的。丁若海实在无法解释：童工出身的父亲，带着资本家赐给的鞭痕，辗转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在临江保卫战中负过重伤，肋骨至今还留有敌人的弹片；入城以来一直废寝忘餐，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如今为什么竟然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太离奇了！太意外了！这个黑锅，他是怎么也不愿意背的。他跟哥哥丁若山的看法一样：爸爸是无辜的，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因此他不但没有心灰意冷，从那浩浩滔滔的政治浪潮中退回来，反而加倍煽旺了自己投身到这场惊涛骇浪中去的激情，他感到只有这样，才得以同自己这个革命家庭固有的光荣传统相称。

罗琴却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家里的问题的。——她爸爸，海外出生的华侨子弟，抗日战争初期，怀着火一样的爱国主义激情，归国投身演剧队从事音乐工作；抗战结束回到海外教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才再度归国参加工作。他是以爱国民主人士和老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被选为市政协委员的。如今据说演剧队是国民党的“别动队”，爸爸又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急先锋”；而且“里通外国”、“蓄意叛国外逃”查有实据……。罗琴深信党是不会错的，群众也是不会错的。看来爸爸罪名成立是无可置疑的了。所以罗琴终于痛苦地感到形势已逼迫着她非同反动爸爸一刀两断不可；而这种决绝，是必须以她自己对领袖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绝对忠诚为证的。她需要从这种绝对忠诚的自我感觉中，拯救自己的心灵，和为反动父亲赎罪。她确确实实是这样做了。甚至当罗文渊“畏罪自杀”，

自绝于人民”之后，女儿罗琴也并没有因此而稍减她体现于自己行动中的那种忠诚。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那股劲，与丁若海的虽然并非同出于一源，但是终于殊途同归，达到了惊人的一致。他们起劲地跳“忠”字舞，搜集像章，制“忠”字牌，比谁都还要狂热。一九六八年到了农场之后，他们还省吃俭用，把辛辛苦苦积攒得来的一些钱买红漆油和小喷筒，利用假日到附近的农村去，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所有地方喷印了无数带头像的语录牌……

是的，在当初，他们就是这样地走过来的。而现在，那些古老的希冀和梦幻，都已长埋在三叶树的根孽之下了。一切都变了！正象丁若海自己说的那样，他连自己那颗怦怦跳动着的心，也长满老茧，难以辨认了。

“小罗，”丁若海扭过头来，望着罗琴那双美丽的大眼睛说，“你算算，周总理逝世多少天了？”

罗琴稍为想了想，答道：“十天了。刚好十天。”

“是的，才十天，”丁若海说，“我们的眼泪还没有干呢！可是，有许多令人愤慨和担心的事情已经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近来，我想得很多，有时候简直想得睡不着觉。我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点离经叛道了。”

“你是怎样离经叛道的？”

“三言两语也说不清。”丁若海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厚厚的信，说：“这是我托你带回去给我哥哥的信，待他到你家取花生芝麻时，请你一并交给他。最好你先拿去看一

下，想一想，看我的慷慨是不是有点多余？”

“给我吧！”罗琴伸手就要取信。

“别忙。”丁若海伸手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那钥匙堆里有一把折叠式的小剪刀。他打开小剪刀，把那封贴得严严密密的信剪开，塞到罗琴手上。

“信开了封，怎能给你哥哥？”罗琴说。

丁若海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圆珠笔，在信封上写了“此信开口”四个字，交回罗琴，说：“手续完备了。行了吧？”他边说边把小剪刀重新折叠好，往口袋里放。

“哎，”罗琴忽然想起了些什么，说道：“快把这小剪刀给我！”

“你要它做什么？”

“给我！给我！等一会才告诉你。”

丁若海顺从地把小剪刀从钥匙扣上退出来，交给她。

罗琴接过小剪刀，半开玩笑地说：

“小丁，你来算个命：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

“哈哈，我又不是星相家！”

罗琴含情脉脉地说：“同房那几个调皮鬼用扑克牌给我算过了，说是今年七夕，乞巧节，我和你定能相会，因为我是织女，命定要在那时候会牛郎……”

丁若海笑道：“但愿如此！”

“我还听她们说过，”罗琴兴致勃勃地说，“有个古老的传说：爱人分别的时候，在他们定情的地方埋下一样带好意头的东西，这双爱人就会别不长，离不久，很快就会重新